

关于北宋初期转运使的几个问题

——兼议北宋几则早期文献的史料意义

戴 扬 本

(华东师范大学 古籍研究所, 上海 200062)

摘 要: 受《通考》引述吕祖谦观点的影响, 北宋初期转运使制度的设立, 多被认为始于随军转运使一职。从文献资料来看, 随军提供粮草, 仅为其功能之一种。事实上, 宋初转运使一职所对应的职能有四, 而建隆年间开始在地方设置转运使实施行政管理的做法, 是太祖和太宗为避免重蹈五代覆辙, 苦心经营的强化中央集权策略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 转运使; 北宋初期; 太祖; 太宗

Abstract: It might be effected by Liu Zuqian's point that the Military Forwarding Magistrate system was regarded as the origin of the Forwarding Magistrate. The thesis analyzed the related historical material, and pointed out that during the reign of Jianlong (建隆), the Forwarding Magistrate had worked as the authorities location and functions. It was the important tactics of centralization step by Taizu and Taizong(太祖和太宗).

Key words: Forwarding Magistrate, early Northern Song Dynasty, Taizu, Taizong

中图分类号: K2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 - 5636 (2007) 04 - 0018 - 06

有关北宋转运使一职的性质和职能, 近十多年来, 学界的基本看法已渐趋一致, 即作为中央政府与州之间路一级的地方行政长官, 而不是过去曾经理解的类似汉唐刺史的监察官员角色。转运使的设置, 是北宋初期加强中央集权政治的一项重要内容, 无论就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而言, 还是对后世地方行政制度的设置, 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北宋初期宋代转运使的史料非常有限, 故诸家史籍在相关的论述中, 多以简略叙述而一笔带过。然而, 即使在这些寥若晨星的史料中, 尚有认识未一的地方, 颇值得进一步加以讨论。本文即在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 就北宋初期随军转运使是否即为转运使的前身, 太祖时期淮南转运使的几则文献的意义, 以及史书中所见与初期转运使职名对应的几种不同职事等几个问题, 略陈管见, 以求教於方家。

—

迄今为止, 凡言及宋初转运使, 多与随军转运使相连。如“宋初路的转运使是作为出征军队的后勤供应官, 及至征服一地, 即转为运送物资回京, 进而成为该地区的财政长官。”^①

即使在关于转运使的专题研究中, 这种观点亦颇为流行, 如“转运使是北宋王朝最早设置的地方官员。宋初征战之时, 称随军转运使, 后战事渐平, 诸路均置转运使, 掌经度一路财赋及监察本路官员优劣, 以便吏、财二权直接握于朝廷之手, 是权力最重的地方官。”^②

还有学者进一步将转运使在北宋初期的发展历程划为三个阶段:“(转运使之职)大别言之, 可分为三大时期, 即: 太祖举兵统一天下时期, 此期之转运使职责为转运军饷; 次为天下粗定时期, 此时之转运使除随军转饷外, 进而有收天下财权归中央之责; 最后为太宗天下一统时期, 此时转运使职责已变为按察刺举, 并于全国设使执行其责。”^③似认为转运使一职的早期阶段即为随军转运使。

诸家虽叙述各异, 却都将随军转运使指为转运使的前身, 且认为转运使即由宋初随军转运使一职转化而成。

上述说法, 依据是《文献通考》卷六一所引的吕祖谦的一段记述:

“国初未尝有监司之目，其始除转运使，止因军兴，专主粮饷，至班师即停罢。如太祖时平泽潞，则命户部侍郎高防、兵部侍郎边光范充北路转运使。用师湖南，则命部判官滕白充南面，给事中沈义伦充京西水陆转运使是也……或谓路，或谓道，或曰知，或曰同，或曰同知，或曰干当，皆缘用武，责以馈运之职也。”^②

继而又谓：“始，转运一司隶州县与夫废置皆在一时，初无定制，所掌者，军需粮饷而已。”下文便直接引用太平兴国二年太宗罢节镇统支郡之事。

综合以上之说，“国初未尝有监司之目，其始除转运使，止因军兴，专主粮饷，至班师即停罢”，显然不以为国初曾有监司之职。又言转运使之设，“皆缘用武，责以馈运之责也”，则明确其职之设制的直接原因是缘于征战时掌管馈运军需物资。又引太平兴国二年太宗罢节镇统支郡之事，便很自然地给人一个印象，即北宋初期转运司之职，不过都是“隶州县与夫废置皆在一时，初无定制”的随军转运使罢了。

是否如吕祖谦所说，随军转运使就是早期形态的转运使呢？情况恐怕并非如此简单。

按太祖朝及太宗朝前期，在后周原有领地的基础上，拓土启疆，原有的十国政权，除吴越王钱俶、闽王陈洪进分别于太宗太平兴国三年三月和四月，以纳土形式归顺北宋王朝外，余皆通过战争的手段解决。包括太祖代周称帝之年，原后周昭义节度使李筠、淮南节度使李重进于建隆元年（960）据所在地起兵，旋遭平定，此后凡重大战事共有七次，及太平兴国四年（981）征服北汉迄，前后绵延长达二十二年。吕祖谦所举太祖、太宗两朝随军转运使名共计十三人，再就《长编》、《会要》、《宋史》等书中检得这段时期内凡涉及随军转运使职的人物共十九人。此将太祖太宗两朝随军转运使在战前以及战后所担任的任职以图表形式列举如下，“战役”即为其以随军转运使身份参加的征战：

姓名	战役	战前任职	战时任职	战后任职	资料来源
边光范	平泽潞（960）	户部侍郎	前军转运使	签判吏部选事，后知襄州	卷 262 卷 1
滕白	平荆湖（963）	知襄州	南面军前水陆转运使		卷 4 卷 61
高防	平西蜀（964）	户部侍郎	前军转运使	知秦州，改知凤州。	卷 270 卷 1
沈义伦	平西蜀（964）	陕西转运使	随军水陆转运使	西川转运使	卷 264 卷 5、卷 7。
曹翰	平西蜀（964）	知均州	西南面水陆转运使	蔡州团练使	卷 260 49- 3 卷 5
赵逢	征太原（969）	知闾州、枢密直学士	随驾转运使		卷 270 49- 3 卷 10
刘仪	征太原（969）	河东转运使	随军转运使		卷 10
王明	平南汉（970）	荆湖转运使	随军转运使	岭南转运副使。	卷 270 49- 3
李符	平南唐（974）	知京西南面转运事	随军转运使	知广州兼转运使	卷 270 49- 3 卷 13
边珣	平南唐（974）	先知扬州，后掌酒税盐矾务	兼领淮南转运使	知江北诸州转运事，后改广南转运使	卷 270 49- 3
许仲宣	平南唐（974）	知荆南转运事	兼南面随军转运事	西川西路转运使，后改岭南转运使	卷 270 49- 3 卷 18、20
刘保勋	平北汉（979）	两浙东北路转运使	行在转运使兼陕西北路转运使	知太原府	卷 19、20 49- 5
侯陟	平北汉（979）	河北转运使	太原东路转运使	权御史中丞事	卷 270 49- 4
雷德骧	平北汉（979）	陕西、河北转运使、陕西北路转运使	太原西路转运使	同知京朝官考课	卷 278 20
乐冲	平北汉（979）		太原管内水陆转运使		卷 61
高继申	平北汉（979）	河北转运使	河北南路都转运使		49- 5 卷 61
郭泌	平北汉（979）		御河至关南水路转运使		49- 5 卷 61
王在田	平北汉（979）		陆路转运使（一作判官）		49- 5 卷 61
崔迈	平北汉（979）		水路转运判官	转运使改知筠州	49- 5、49- 6 卷 61

资料来源：为《宋史》，为《长编》，为《宋会要·食货》，为《通考》。

上列十九人中，乐冲、郭泌等四人资料不详，余十五人在受命任随军转运使之前，有九人已经担任过转运使或有过知地方转运使的经历，为总人数一半强。这些资料，虽不足以反映全部随军转运使的情况，对比前引“国初未尝有监司之目，其始除转运使，止因军兴，专主粮饷，至班师即停罢”之说，吕祖谦的依据是不够充分的。

从上述随军转运使的出身和履历来看，个人经历虽各有别，共同之处则皆具治理地方政务的优异才干。结合乾德三年设置转运使以实现“利归公上而外权削”的目的来看，此恰恰符合派驻地方的深远用意。除了建隆元年征讨李筠和李重进的随军转运使高防属于后周武将出身，以及配合征服西蜀的滕白等三人为情况不详，余十四人的仕履背景皆为文臣，如边珣为进士出身，王明则举进士而不第。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有无进士出身，在传记材料中被称作“有吏干”、“以清干闻”者，即具有较强的处理行政事务能力的有多位，如沈义伦，后周时即为太祖幕下，被辟为从事，掌留使财货，极受太祖信任，亦富有治理才干，太祖朝开宝六年拜官中书侍郎、平章事，太宗即位不久，加右仆射兼门下侍郎、监修国史，位至宰相。又如边光范，以吏干称，按《宋史》卷二六二《边光范传》：“（光范）性谦逊和雅，有吏材。”后周显德三年，曾受命前往大名检民田，普均租税。建隆元年出兵进讨李筠，“命光范为前军转运，计度郑、洛、汝、孟、怀、邠粮。”光范后知襄州，乾德二年，宋军由陕西路进讨西蜀，“出汉上，光范复当供亿，人不知劳。”

李符的经历更为典型。早先在知归州任上，凡转运司制置不合理的地方，“符即上言，上嘉之。开宝五年八月，命知京西南面转运事，书‘李符到处似朕亲行’八字赐之，令揭大旗，常以自随。符前后条奏便宜凡百余条，其四十八事皆施行著于令。”^{[13](p.288)}及开宝七年南唐之役，命为随军转运使，控扼长江中游之势。

又如许仲宣，“开宝四年，知荆南转运事。及征江南，又兼南面随军转运事。兵数十万，供馈无阙。南唐平，以漕挽功拜刑部郎中，知永兴军事。太宗即位，授西川转运使。…改广南转运使。”^{[14](p.9268)}侯陟，“建隆初为冤句令，以清干闻。二年，擢为左拾遗，仍知县事。…四年令兼领本县屯兵。俄改淮南转运使。…太平兴国初，出为河北转运使。征太原，为太原东路转运使。”^{[15](p.9273)}雷德骧，“开宝七年，同知贡举。太祖崩，以德骧为吴越国告哀使。还，迁户部员外郎兼御史知杂事，改职方员外郎，充陕西、河北转运使。历礼部、户部郎中，入为度支判官。太平兴国四年，车驾征太原，为太原西路转运使。…又命为两浙转运使。端拱中，迁户部侍郎。”^{[16](p.9453)}

再如王明，“每下一郡一城，必先保其簿书，守其仓库。”当天下未定之时，“戡靖乱略，划削僭伪，驾驭英杰，抚定区夏，而明感会风云之际，周旋金革之间，勤饷王师，生擒伪将，卒能下岭表，平江南，继成大功，论籍第一。”^{[17](p.9266)}边珣，“宋初，诣卫州视秋稼及掌京仓。乾德初，召为仓部郎中。…开宝初，迁职方郎中，监京兆曲务。又掌建安军榷货，奏徙务扬州。…就命权知州事，仍兼榷货务。罢郡，又兼掌酒税盐矾务。”^{[18](p.9264)}

这些所谓强干之人表现出来的行政能力，是他们受命随军转运使重任的主要原因。在上述随军转运使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未任转运使，亦多有主持地方民政事务的知州，或有类似经管榷货务的经历，以胜任战时调运物资之需。除了建隆元年征讨李筠时任南面水陆转运使的高防外，后几任随军转运使的任命，都无例外地就近选择有处理地方行政事务经验的官员，如乾德元年平荆南时，命以知襄州滕白南面军前水陆转运使，开宝七年伐南唐，命以知扬州边珣兼淮南转运使。到了后期，这种做法，几乎沿为成例。

任命随军转运使官员的一个基本要求，是办事效率干练与否，尤其是以处理地方行政事务的能力为首要衡量标准。开宝二年，太祖出征北汉时，因转运使调度不力，潞州城中车乘塞道，交通阻隔，宰相赵普献计曰“但当择治剧者莅此州耳”，遂命户部员外郎、知制诰王祐权知潞州。“祐即发遣车乘，行路无阻”^{[19](p.217)}就是一个例子。

治剧者，即有成功治理大藩经历的官员。这个例子解答了为什么凡有征战，多选择有转运使经历的官员来担任随军转运使之任。至于后人认为“宋初设转运使作为征讨大军的粮饷官，也是地方及新征服地区的财物运往朝廷的督运官。后演变为路级财政长官，机构称转运使司”，都是在吕祖谦之说基础上的推测之言罢了。

那么，包括吕祖谦在内，后人为何会产生随军转运使在完成征战之后，留驻地方转为转运使这样一种错觉呢？推其原因可能有二，前后七次征战是关系到王朝统一大业的大事，故叙述北宋早期历史的文献中，频见王师出征及有关随军转运使的记载，导致所谓“记忆的优先权”效应，此其一；北宋设置转运使来主持地方行政，替易五代以来的节度使制度，到最终全面实现以转运使为路一级的行政长官，前后延续二十余年。然与后来的路转运司之转运使相比，早期转运使的权限、职能皆未明确，故而建隆、乾德年间，相关记载虽非仅见，数量却十分有限，此其二。

关于转运使设立的时间及其意义，马端临有一段话很值得注意：“自乾德以后僭伪略平，始置诸道转运使，以总利权。”^{[20](p.556)}下乾德以后，具体说就是乾德三年，而“僭伪略平”，则提示我们实施的地区范围与逐次平定的地方政权有关。关于建置的过程，李焘在《长编》中对此有十分详细的记载：

自唐天宝以来，方镇屯重兵，多以赋入自贍，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殊鲜。五代方镇益彊，率令部曲主场院，厚敛以自利。其属三司者，补大吏临之，输额之外辄入己，或私纳货赂，名曰贡奉，用冀恩赏。上始即位，犹循常制，牧守来朝，皆有贡奉。及赵普为相，劝上革去其弊。是月，申明诸州，度支经费外，凡金帛以助军实，悉送都下，无得占留。（小注：去年已有此诏，故此云申命）时方镇阙守帅，稍命文臣权知，所在场院，间遣京朝官廷臣监临，又置转运使、通判为之条禁，文簿渐为精密，由是利归公上而外权削矣。^{[11](p.152)[12](p.4347)}

可见设转运使的目的，是通过“制其钱谷”手段，实施经济上的集中管理，地方上的财政收入，“悉送都下，无得

占留”。这个计划得以推行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因为北宋初期，在诸多地方政权被平定之后原十国地区，出现了权力的真空。“僭伪略平”经历了大约二十余年，正是利用这段时间，太祖和太宗“置转运使、通判为之条禁，文簿渐为精密”，着手对地方行政制度进行了重新更制。

正如沈伦、李符、侯陟、许仲宣等人的经历所显示的那样，因为他们具备了担任地方转运使的经历，非常时刻，便膺命为随军转运使重任。所以，关于转运使一职是“随军转运使在完成征服地方割据政权后，留在当地负责向中央政府缴纳赋税而逐渐演变而来”的说法，虽为诸多史籍相袭，却是不确的。

二

值得关注的是，在极为有限的现存史料中，有数条有关淮南转运使的记载。

“乾德元年正月，以沈义伦为京西、韩彦卿为淮南转运使，诸道置转运使始见此。”^③

“（苏晓）乾德三年，出为淮南转运使，建议榷薪、黄、舒、庐、寿五州茶，置十四场，规其利，岁入百余万缗。”^④
(p. 9259)

《长编》有关早期转运使的记载也与淮南转运使有关：“（乾德元年十月）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扈蒙，以仆夫扈继远为从子，蒙属之同年生淮南转运使仇华，使厘务。继远盗官盐，事发，戊申，扈蒙坐夺金紫，黜为左赞善大夫。”^⑤(p. 107)

扈蒙后周时为右拾遗、直史馆、知制诰。入宋后，由中书舍人迁翰林学士。《宋史》本传亦记此事，称其“坐请托于同年仇华，黜为太子左赞善大夫”。^⑥

由此可见，至迟在乾德元年，淮南已设置转运使，且掌管了官盐买卖等事务，获利丰厚，故扈蒙为自己亲属谋取一职，还不得不走门路请托。

扈蒙于乾德元年十月受牵累被罚，而扈继远进入淮南转运使属下就职，以及淮南转运司的成立，无疑在此之前，因而淮南转运使一职的实际设立，当可再上溯相当一段时间。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淮南地区的转运使，极有可能就是直接沿承了五代时期后周的江北诸州水陆转运使的设置。^⑦因为江淮地区自唐代后期起，就已经凸现其经济上的重大意义，淮南转运使成为当时源源不断地向中央王朝缴纳赋税运输粮食的管道。

对于北宋初期的经济而言，江淮地区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北宋平复江南地区在开宝九年，此前，“开宝五年，率汴、蔡两河公私船，运江淮米数十万石以给兵食。”^⑧(p. 4250)可见淮南地区自身的重要意义不容忽略。

尽管有关北宋早期转运使的资料极为稀见，且这些史料似乎并无内在的连贯性，不足引起人们的关注，但是，唯独有关淮南转运使的记载不止一次地出现在文献中，显示了淮南地区之于北宋政权的重要性。一个熟悉的例子便是，宋太祖“生于洛阳，乐其土风”，一度曾动念迁都西京。然而，对于河运的依赖，使他不得不屈从现实，接受臣下的劝谏，改变了原来的想法。“太祖幸西京，将徙都，群臣不欲留。时节度使李怀忠乘间谏曰：‘东京有汴渠之漕，坐致江淮之粟四五十万，以贍百万之军，陛下居此，将安取之？且府库、重兵皆在东京，陛下谁与此处乎？上乃还。’”^⑨

由此可知，当宋太祖和太宗开始进行南北一统的征服大业时，随军转运使承担着保证军需供给，配合作战的重大使命，其意义自不待言。与此同时，还有一种转运使，亦在承担着它的重要使命，例如为中央政府输送经济上支持的淮南转运使。虽然不及出征大军的宏大场面，对北宋政府来说，其意义当不逊于随军转运使。北宋初期的史籍记载，多关注的是征战中建立煌煌功勋的随军转运使，而忽略了类似淮南转运使的存在，以至后人在读到“国初未尝有监司之目，其始除转运使止因军兴，专主粮饷，至班师即罢罢”的结论之语时，未免为之遮蔽了自己的视线。

再看宋初转运使之称的内涵。从上述有关史料得知，北宋初期除了随军转运使外，尚有承继五代时期制度之旧的地方转运使设置，如淮南转运使就是一例。吕祖谦之误，是由于未谙宋初转运使一职所包含内容多重性的特点，忽略了后来被称作监司之路长官的转运使与随军转运使这两种不同的职务之间的差别，遂在阐述的形式上，使人产生二者在时间上有前后相承关系的错觉来。

宋初转运使一职所包含内容的多重性，究其原因，是因为转运使之职名原非宋太祖自创，而是沿用了唐五代盐铁转运使和诸州水陆转运使一职旧称的缘故。宋初制度尚未健全，故转运使职名所对应的职务，呈现为多样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这对我们理解宋初转运使一职的特点来说具有非常关键的意义。赵宋建朝之初，不得不保留了唐五代的节度使制度，所谓“杯酒释兵权”之举，是将几位一道策划“陈桥兵变”且仍掌控着禁军的宿将分封为地方节度使，从而化解了对皇权的直接威胁，避免自己成为五代之后的第六个短命王朝，而介于中央和地方州县之间的“支郡”，以及支郡的“留中”问题都还未予以解决。前引乾德三年诏书所云“上始即位，犹循常制，牧守来朝，皆有贡奉”，即表明宋太祖乾德三年之前，对地方的控制，尤其是经济上的控制，远未及后来的深度，这就是乾德三年“置转运使、通判为之条禁，文簿渐为精密，由是利归公上而外权削”要解决的问题和实现的目的。

再回过头来看宋初各种转运使之职，从其承担的职责来看，大致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数见于《长编》记载的乾德年间淮南转运使，其职务包括地方盐政的管理，同时，又兼有运输南方地区粮食的重任。这类转运使便是直接沿袭了唐五代时期的盐铁转运使或水陆转运使的传统职能。

第二类,“止因军兴,专主粮饷”,为负责后勤供应的随军转运使。顾名思义,其职责便是为投入战争的军队提供粮草等各类军需物品的供应。从前面列举的表格中我们还可以看到,随军转运使之称亦非有一定之规,或作随军水陆转运使、南面军前随军转运使,西南面水陆转运使、随驾转运使(如太祖或太宗亲征的话)、太原东路转运使、御河至关南水路转运使、御河至关南水路转运使,等等。更有在名称上未著有随军之词,比如开宝年间边珣权知扬州,“罢郡,又兼掌酒税盐矾事,……会征江表,兼领淮南转运使。”^[16](p.9234)]此淮南转运使虽未冠以“随军”二字,显而易见是作为应对征南唐之战所设,其所掌职事也不等同原来意义上的淮南转运使。

第三类,随着平复地方割据政权的进展,出现了以节度使的身份同时兼领数道水陆转运使的职衔,如潘美和尹崇珂兼任的岭南道转运使。虽皆冠以转运使名义之衔,却并非“巡历部内,经度一路财赋”,亦不关检刺地方官吏的行政管理。潘美、尹崇珂兼任的岭南转运使职务,一如唐代李筠于贞元十五年以常州刺史为润州刺史、浙西观察使及诸道盐铁转运使^[17](p.389)]和高骈于乾符五年以荆南节度使迁润州刺史、镇海军节度使、浙江西道观察使兼江淮盐铁转运使^[18](p.700)]。与李筠、高骈不同的是,潘美、尹崇珂在岭表得以安定后不久,即率师离开了岭南,显而易见,这种任命的用意主要是在展示一种强化直接管理的象征意义,当然也包含了太祖对该地区收复之初转输任务的重视。

第四类,如开宝五年十一月庚辰,“命吏部侍郎参知政事薛居正兼提点三司淮南、湖南、岭南诸州转运使事,吕余庆兼提点三司荆南、剑南诸州水陆转运使事。”^[19](p.232)]六年,薛居正拜门下侍郎平章事,仍兼提点转运使事。又以中书侍郎平章事沈伦兼提点荆南、剑南转运使事,此皆属于宰相遥领地方使职的形式,其主要意义是代表中央对地方控制的加强,同样不具备后来路转运使管理兼沟通中央与州军之间上传下达角色的行政长官的功能。

综上所述,这四类转运使的角色,与我们研究的转运司路的转运使之间,不可简单划上等号或确认其先后生成关系。倘若不就其内涵作明确的区分,而仅仅依据字面上的“转运使”之称,便作为转运司路之转运使设置的根据,是很难辨析清楚其职名内涵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体现太祖强化中央集权政治明确意向的措施之一,即后来被称作“监司”的转运司路之转运使一职的设置,在乾德三年之前其实并未形成。因此,虽然我们可以在称谓形式上寻找到彼此间的渊源关系,其内涵却有着本质的区别,简单指认前者为后者之前身,并不能有助我们对路转运使一职形成的认识。不妨以“摸着石头过河”,来理解宋初太祖太宗两朝为收控地方权限,在行政设置上循序渐进的做法,或许更容易把握北宋初转运使设置过程的实质。

注 释:

陈振:《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页137。又如“宋初,设转运使作为征讨大军的粮饷官,也是地方及新征服地区的财物运往朝廷的督运官。后演变为路级财政长官,机构称转运使司。”见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中古时代·五代辽宋夏金时期(上)》第七卷之丙编《典志·第八章·政治制度》第五节《宋代的地方政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页833。

《文献通考》卷六一《职官十五》,页557上、中;又见《玉海》卷一八二《乾德转运使》。按吕祖谦“用师湖南,……给事中沈义伦充京西水陆转运使是也”之说,所言失考。沈义伦充水陆转运使为乾德二年伐蜀时事,《长编》卷五乾德二年:“十一月甲戌,命忠武节度使王全斌为西川行营凤州路都部署、武信节度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大名崔彦进副之,枢密副使王仁贍为都监,宁江节度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刘光义为归州路副都部署,内客省使、枢密承旨曹彬为都监。合步骑六万,分路进讨。给事中沈义伦为随军转运使,均州刺史大名曹翰为西南面转运使。”《宋史》之《沈伦传》及《东都事略》、《东宗实录》记沈伦事迹,皆未见其参与荆湖之役事。详见拙文《玉海》卷一八二沈义伦任京西转运使之说更论》,载《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1期第107页。

《玉海》卷一八二《乾德转运使》。沈伦京西之任当为陕西,参见。

《宋史》卷二六九《寇蒙传》,页9239。有关仇华任淮南转运使的这条史料及其意义,至今似未能引起研究转运使制度学者的足够关注。

李昌宪在《宋代路制研究》一文中亦认为,除了随军转运使一职外,常设的地区性的转运使,也逐渐成为五代后期的一种制度,如后周显德五年三月,世宗平定淮南地区,得十四州、六十县,不久即任命张正“充江北诸州水陆转运使”就是一例。见《国学研究》第九卷,北京大学,2002年。

《涑水记闻》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页7。按“坐致江淮之粟四五千万”,“千万”疑当作“百万”,参看《长编》卷一七开宝九年四月癸卯:“李怀忠乘间言曰:‘东京由汴渠之漕,岁致江淮米数百万斛,都下兵数十万人,咸仰给焉。’”页369。

参考文献:

- [1] 李之亮. 北宋河东路转运使编年[J].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第17卷第2期).
- [2] 谢兴周. 宋代转运使之建置及其在路制中之地位与影响[J]. 东吴历史学报(台北), 1997, (3).
- [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M]. (开宝五年八月癸巳). 北京:中华书局, 1979.
- [4] 宋史(卷二七〇)·许仲宣传[M]. 北京:中华书局, 1977.
- [5] 宋史(卷二七〇)·侯陟传[M]. 北京:中华书局, 1977.
- [6] 宋史(卷二七八)·雷德骧传[M]. 北京:中华书局, 1977.
- [7] 宋史(卷二七〇)·王明传[M]. 北京:中华书局, 1977.
- [8] 宋史(卷二七〇)·边珣传[M]. 北京:中华书局, 1977.

[9]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M]. (开宝二年二月乙亥) 北京:中华书局 ,1979.
[10] 文献通考 (卷六一)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1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M]. (乾德三年三月) 北京:中华书局 ,1979.
[12] 宋史(卷一七九)·食货下一[M]. 北京:中华书局 ,1977.
[13] 宋史(卷 270)·苏晓传[M]. 北京:中华书局 ,1977.
[1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M]. (乾德元年十月丁未). 北京:中华书局 ,1979.
[15] 宋史(卷一七五)·食货上三[M]. 北京:中华书局 ,1977.
[16] 宋史(卷二百七十)·边珣传[M]. 北京:中华书局 ,1977.
[17] 旧唐书(卷一三)·德宗纪[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18] 旧唐书(卷一九下)·僖宗纪[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19]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M]. (开宝五年十一月庚辰) 北京:中华书局 ,1979.

(上接第 74 页)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第 207- 208 页。"四大金刚"为黄体芳、张佩纶、陈宝琛和宝廷。见刘声木 :《楚斋随笔 (续笔三笔四笔五笔)》, 中华书局 1998 年版 ,第 603 页。'翰林四谏'通常指黄体芳、宝廷、张佩纶和张之洞 ,《清史稿》卷四四四曰 : '体芳、宝廷、佩纶与张之洞 ,时称翰林四谏 ,有大政事 ,必具疏论是非'。但也有不同说法 ,如黄濬一度认为 '四谏'指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邓承修 ,并不包括黄体芳 ,后又认为 "说本不一 ,不必定指何人"。(见《花随人圣庵摭忆》,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84 页 ,第 220- 221 页)陈宝琛则认为 '四谏'指黄体芳、张佩纶、宝廷和何金寿。(见《趁趣楼诗集》卷七 ,第 6 页)张之洞《寿黄漱兰通政六十》则有 '后雕独有贞松在 ,四谏荣名冠翰林'之句 (见《黄体芳集》,第 371 页)。考之《清史稿》和当事人的记述 ,黄体芳应在 '翰林四谏'之列。

易惠莉 :《同治年间上海本邑绅士的生活价值取向——以张焕纶为主要考察对象 (下)》,《历史教学问题》2005 年第 4 期 ,第 4 页。关于 '同治中兴'时期官僚士大夫为恢复统治秩序的努力以及他们的中兴信念 ,详见芮玛丽《同治中兴 :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 (1862- 187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相关章节。

参考文献 :

[1] 柯文. 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 - 王韬与晚清改革[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2] 孙延钊. 瑞安五黄先生系年合谱[A]. 周立人. 徐和雍. 孙延钊集[C].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6.
[3] 宋恕. 书陈蜚庐治平通议后[A]. 胡珠生. 宋恕集 (上) [C]. 北京: 中华书局, 1993.
[4] 俞天舒. 黄体芳集[C].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4.
[5] 章炳麟. 孙逊学先生年谱序[A]. 孙延钊. 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
[6] 赵尔巽等. 清史稿(卷四四四)[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7] 朱祖谋. 澍于集跋[A]. 张佩纶. 澍于集[C]. 民国丰润澍于草堂刊本. 卷首.
[8] 陈夔龙. 梦蕉亭杂记 (卷一) [M].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5.
[9] 沈渭滨. 论陈宝琛与"前清流"[J]. 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1995 , (1)
[10] 彭明. 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 :1840- 1949[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11] 震钧. 天咫偶闻 (卷六) [M].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2.
[12] 费行简. 近代名人小传[M]. 台北: 文海出版社影印本.
[13] 朱寿朋. 光绪朝东华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8.
[14] 苑书义等. 张之洞全集[C].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8.
[15] 张佩纶. 请广开言路折[A]. 澍于集·奏议 (卷一) [C]. 民国丰润澍于草堂刊本.
[16] 夏东元. 郑观应集[C].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17] 王韬. 韬园文录外编[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
[18] 郭嵩焘. 郭嵩焘日记 (三) [Z].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19] 郭嵩焘. 郭嵩焘奏稿[C]. 长沙: 岳麓书社, 1983.
[20] 翁同龢. 翁同龢日记 (三) [Z]. 北京: 中华书局, 1993.
[21] 季南. 英国对华外交 :1880- 1885[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22] 中国史学会. 洋务运动 (三) [C].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
[23] 中国史学会. 洋务运动 (一) [C].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
[24] 转引自邹范林. 论晚清的前期清流[J]. 山西大学学报, 1985 , (3)
[25] 中国史学会. 洋务运动 (二) [C].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
[26] Mary Rankin. "Public Opinion" and Political Power: Qingyi in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Journal or Asian Studies, Vol. XLI, No.3, May 1982.
[27] 张佩纶. 致左恪靖师相[A]. 澍于集·书牋 (卷一) [C]. 民国丰润澍于草堂刊本.